



(接上頁) 美國的帝國主義隨着蘇聯的解體達到巔峰,但在近些年面臨衰落。因此美國必須要發動新一輪的冷戰,找到新的敵人來擴張軍事機器,才能維持自身的霸權。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最有革命性的黑人國際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一直受到美國當權者的鎮壓,無從實現革命。而其他美國大眾,特別是白人,雖然也遭受着資本主義的壓迫,卻被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意識形態所迷惑,沒有意識到自身的不幸源於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與全世界各國被壓迫人民是連在一起的。因此在希爾維特和海防看來,美帝國主義犯下的罪行,從來不是偶然,也從來不是只限於少數人,而是美國整個體制的必然。從兩黨的政客,到華爾街的精英,到軍隊和警察,再到普通美國民眾,全都是美帝國主義對全世界壓迫的幫兇。不過,這套美帝國主義的論證,雖然在美國人眼裡算是非常激進和離經叛道的,但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算陌生,中國讀者從中未必能夠發現太多新鮮之處。但《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可以給讀者帶來的啟示,不只是這略顯粗糙的論證結果,還有其論證過程。一方面,作者在整部書中,刻意避開了主流白人學術體系,基本都在引用少數族裔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作品與行動,從黑人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來看待美國冷戰歷史。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黑人歷史學家和共產主義者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作者援引了作為歷史學家的杜波依斯的史學著作,來批判美國的種族主義歷史,也回顧了冷戰時期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杜波依斯支持國際共運並被美國政府迫害的歷史。而另一方面,作者更是花大篇幅回顧了美國激進運動,特別是黑豹黨被壓迫和抗爭的歷史。書中將黑豹黨的興衰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繫起來,既是在批判美帝國主義對包括美國黑人在內的世界人民的壓迫,也是在為當前世界人民如何抗爭提供歷史經驗。比如書中回顧了美國政府對共產主義者的監禁和暗殺,美國聯邦調查局對黑豹黨社區服務的打擊,以及美國媒體對黑豹黨的污名化。這些歷史既被用來說明黑豹黨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是怎樣在美帝國主義的鎮壓下衰落,也被用來指出新一輪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應該從何處發起。FBI 前局長胡佛曾經把黑豹黨視為對美國的“最大威脅”,而他認為黑豹黨做的最有威脅的舉動是什麼呢?是給貧民窟兒童送早餐從而獲取人心。必須指出的是,如果純粹從學術的角度看,《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對美國黑豹黨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描繪是存在一些偏差的。但是,該書的價值也並不在於研究本身,而是在於其視角。希爾維特和海防不是從中立的學術的角度看待美國歷史,將黑豹黨視為一個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從美國少數族裔共產主義運動者的視角出發,將美國歷史視為自身存在的背景,將黑豹黨視為自身事業的先行者。雖然隨着桑德斯和民主黨激進派的興起,“社會主義”(或者說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變得流行了起來,但“共產主義者”、特別是希爾維特和海防這種激進的有思想體系的共產主義者,而不是隨大流在街上喊兩句革命口號的人,在美國其實仍然很少見。在這裡,就有必要提到該書作者的身份和現狀了,為什麼希爾維特和海防可以採取這樣的視角分析問題,為什麼他們的書可以代表過去的、黑豹黨和現在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雖然都是青年學者和記者,沒經歷過冷戰時期的鬥爭,但和前輩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比如為該書寫後記的格倫·福特(Glen Ford),不光是美國著名記者,也是前黑豹黨成員和越戰老兵,從冷戰時期就參與了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福特一直致力於黑人運動和共產主義的輿論宣傳,並創辦了存續至今的媒體“黑人議程報告(Black Agenda Report)”。希爾維特和海防兩

人都加入了福特創建的“黑人議程報告”。而福特也秉承着當年黑豹黨時代的共產主義革命精神來對待他們,不光將他們視為工作同事,更視作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同志”和“戰友”。這也就是為什麼,希爾維特和海防對美國歷史的認知,對美帝國主義的分析,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號召,與伊·牛頓(Huey Percy Newton)這些黑豹黨領袖是完全一致的。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更

像是一篇如果黑豹黨留存至今,他們會如何分析和看待冷戰歷史和美國現狀的政治宣言。雖然黑豹黨在美國歷史上曇花一現,雖然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在美國成為主流,但這些進步思想仍然在美國延續了下來。曾經的共產主義者保存了火種,並將其傳給了新一代的革命者。後者雖然暫時還沒有能力重現轟轟烈烈的過往,但也依然關切着美國被壓迫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為共產主義運動做出貢獻。因此,《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出版本身,既是舊時代的紀念,也是新時代的象徵。當我們在閱讀此書的時候,不光是閱讀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過去,也是在閱讀它的現在和未來。但是,一個諷刺的現實是,我們之所以能看到這本激進的書在美國出版,作者們之所以還能在美國高喊推翻帝國主義,沒有面臨當年黑豹黨和共產主義者的命運,是因為他們毫無影響力。正如《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書中強調的,美國的言論自由只留給沒有威脅

人恢復元氣,並建立與我們核心價值相符的民主政權,並且讓他們成為可以保護這些價值的盟友。‘美國治下的和平’是某種帝國……但按照歷史的標準,這是一個非常善意的帝國,是由軟實力和信譽而非強力凝聚而成的帝國。”雖然立場不同,但克魯格曼的這種認知,和加迪斯其實也沒有什麼本質差別。克魯格曼在美國自由派學者當中,已經算是經常跟政府唱反調的人了。如果這樣的學者對於美國擴張侵略的歷史都抱有“美國例外論”的潛意識認知,別的學者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正如希爾維特和海防所指出的:

“不光是我們的心靈被這些意識形態及背後的支持者所塑造,我們的物質世界也被他們深刻影響。他們限制了我們向‘別處’思考的能力。雖然摧毀美國例外論和美國無辜論的意識形態並不會讓不公正也隨之被去除,但我們尋求集體解放的鬥爭,必須一直拒絕聲稱美國是仁慈的、愛好自由的這種‘假新聞’。”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這些被“美國例外論”所影響的美國學者以及媒體仍然是我們主要的信息來源之一,那麼我們又是否會被美國例外論的意識形態所間接影響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爭論:你每天黑美國水深火熱,我怎麼感覺美國歌舞升平;你說美國一天天衰落,我怎麼看到人們仍然對美國趨之若鶩……其實這些問題脫離了具體情境都是沒有意義的。美國的好與壞,樂與苦,興與衰,並不會平等地降臨在每一個人的頭上,一切都取決於你從什麼視角什麼立場來看美國。那些在灣區過着中產精緻生活的亞裔碼農和死在亞特蘭大按摩店的亞裔女性,共享了同樣的命運嗎?再極端點,剛當上波士頓市長的吳弭,和前几天在芝加哥被槍殺的中國留學生,看到的又是同一個美國嗎?就如同這世界上的任何國家一樣,美國是複雜的,是不可能從單一視角看清楚的,即便是在美國住了很久的中國人,也未必能跳出自己的圈子看到視野之外的美國,更不用說遠在大洋彼岸的人,看待美國又會帶有怎樣的濾鏡。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立場特別難得,因為他們能夠真正跳出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思維框架,提供從主流渠道那里看不到的視角,並且讓我們自身反思自己所接收到的信息和輿論究竟帶有怎樣的暗示。儘管他們的這種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在美國是邊緣化的,他們所提供的視角只能代表極小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對於我們這些身處美國之外的中國人,如果不希望自己對美國的信息來源被美國固有的意識形態所壟斷,那麼這些更多元的視角就非常必要了。更何況,雖然只是少數派的視角,但《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對於當今美國的現實,還是有着很強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正如我在本文一開頭所說的,雖然是本寫在特朗普執政的2019年的書,但讀起來就像寫給拜登執政的2021年。比如,希爾維特和海防雖然身為少數族裔,但仍在《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對美國民主黨主導的“政治正確”,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這樣的少數族裔民權運動,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他們認為,民主黨和自由派主導的社會運動(作者稱之為“包容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本身就是一種美國例外論的意識形態工具:如果少數族裔把“包容”誤以為權力,以為有了黑人警察,有了黑人軍人,有了黑人政客,甚至還有了黑人總統,黑人的處境就得到了提陞……那麼少數族裔就會滿足於現狀,不去追究歧視背後更深層次的系統性問題。但是,作者非常尖銳地質問:如果壓迫人民的美帝國主義的機器沒有被破壞,僅僅是單純地“包容”了更多的人,展現出了更多的“多樣性(diversity)”,又怎麼能解決壓迫呢?難道奧巴馬當總統的時候,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黑人的貧困和教育問題,黑人所面臨的系統性歧視,就神奇地消失了嗎?遺憾的是,美國的少數族裔確實是吃這一套“包容政治”的,誰都喜歡成功學的故事。前幾天波士頓第一次選出了華裔女市長,不也給美國華人補了很多雞湯嘛,大家也早就忘了前幾個月貌似聲勢浩大的亞裔民權運動最後的結局——就是沒有結局。所以我們看到,拜登政府一上台,組閣的核心思路就是希爾維特和海防所批判的“包容政治”,把各種性別族裔宗教性取向都排列組合了一遍,LGBT、黑人、拉美裔、女性、天主教、猶太教……一個都不能少。不光內閣如此,軍隊中也在大力推廣“多樣化”:一邊推上美軍首位變性人四星上將,一邊把徵兵廣告變成了宣揚族裔多樣性的溫情動畫

片。比如其中一個徵兵廣告的故事是:一個姑娘生長在同性戀家庭,為了打破偏見證明自己,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冒險,覺得去意大利留學和去爬山都不夠有挑戰性,於是就……加入了軍隊。這個徵兵廣告的無厘頭程度,讓我覺得它其實是在黑性少數群體和女性……很多人可能會嘲笑這些徵兵廣告,認為一個姑娘有兩個媽的故事簡直莫名其妙跟軍隊毫不相干。但是當你嘲笑美軍不懂軍事的時候,美軍可能還要嘲笑你不懂政治呢。維護美國例外論,用所謂“政治正確”籠絡住國內的少數群體,這個政治需求,可比美軍多徵一兩個兵重要多了。所以簡而言之,《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一個核心論點,就是“美國例外論”根植於整個系統,而非任何黨派和政客。雖然各種主流政治勢力都意識到了美國如今出了問題,但他們不會改變美國的帝國主義體系。即便是最激進的那些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民主黨“進步派”,以及那些組織少數族裔運動的社會活動家,都在間接地維護着“美國例外論”。因此,無論誰上台,無論何種政治勢力,都不會停止對美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壓迫,反而會繼續用民主和人權的口號干涉他國內政,將中俄立為新冷戰的對手。希爾維特和海防認為,正是因為美國自身的政治經濟體制在近年來衰敗了,所以美國當權者才需要新的敵人,讓美國人以為對民主的威脅來自於外部勢力,而不是美國民主自身的缺陷:“與第一次冷戰不同,那時候針對的是共產主義運動取代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真正威脅,這一次新冷戰的原因在於美國例外論自身的失敗……(指控他人)可以將美國體制危機的責任轉移到外部勢力上。而事實上,我們國家的民主一直就是個被巧妙掩蓋的耻辱。”即便美國政府更新換代,其“美國例外論”的意識形態內核仍然不會有變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拜登在就任之後的第一場新聞發佈會,就十分配合《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判斷,將與中國的競爭定性為民主與專制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

“我預計你,還有你的孩子或者孫子,將要在博士論文中研究這樣一個問題:誰將會成功,是民主還是專制?因為這就是我們的賭注,這不只是關於中國本身。”確實,我們的後代肯定要在博士論文里研究中美競爭這樣一個問題,只不過無關民主和專制成功與否,而是關乎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到底誰贏誰輸,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賭注。有人肯定會問,我總是寫文章說美帝國主義這不好那不好,自己又在美國留學,到底是什麼居心,是不是所謂“黑美國是工作,去美國是生活”?其實道理也很簡單,美國的帝國主義,以及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敵意,就是定義當今和未來世界的主題。不管我們叫它新冷戰也好,還是所謂的競爭也罷,這都是逃不掉的。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認為你是他們的最大威脅之時,如果你想要世界和平與發展,那你最好真的是個威脅。而我們個人的命運,和歷史進程當然是分不開的,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逃離時代浪潮的能力。不是說這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源自美帝國主義,但它總能給這個世界製造問題,不管你身處中國還是美國。這世上當然有千萬個問題,沒有美帝國主義的存在當然也有別的問題,但剛好我對美帝國主義的問題最為熟悉,就想寫出點東西跟大家分享。且不說我本來也沒打算留在美國,也不說很多視角只有身在美國才能發現……我身在哪里,寫了什麼,跟美國做了什麼和要做什么,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美國政治的極端與分裂就消失了?難道美國社會的教育、毒品、犯罪問題就不存在了?難道美軍對他國平民的殺戮就停止了?難道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和對中國人的歧視就沒有了?我就一個普通人,還能做啥呢?也就只能像《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作者那樣,隨便寫點什麼,讓大家知道影響我們個人和世界命運的美帝國主義,究竟是一回事。至於我們這個時代未來將是怎樣,這不取決於我寫了什麼或你們看了什麼,而取決於我們做了什麼。(完)



的人,像黑豹黨那樣有組織有武裝的勢力,就連給貧民窟兒童送早餐都要成為 FBI 的眼中釘。相比之下,如今美國稍微有組織的最激進的勢力,也就只剩下表演慾望強烈的民主黨“進步派”了。希爾維特和海防這種極少數派只能寫寫書發發推特,既不能像斯諾登那樣抖出國家機密,也不能像當年黑豹黨那樣真搞武裝鬥爭,純純的吉祥物能翻得了天嗎?

如今美國最激進的政客,民主黨“進步派”明星 AOC,其激進行為就是穿着一件寫着“向富人收稅”(TAX THE RICH)的衣服參加富豪名流的晚會 Met Gala,以及號召支持者在她的網店買“TAX THE RICH”系列商品,比如 58 美元一件的運動衫(Made in USA!)。誰將會成功?不過,可能有人會問,即便我們知道了《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擁有難得的美國共產主義者的立場,但這畢竟只是一本寫給美國大眾的政治宣言,而且還是一篇毫無影響力的宣言,對我們中國人又有什麼意義呢?因為該書的“美國共產主義者”立場本身,就是價值所在。在社會高度政治化的美國,任何的歷史敘事都不可避免地會帶上敘事者的立場,不光媒體政客如此,學者也不可能免俗。比如保守派美國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雖然並不避諱美國人的帝國主義行為,但他依然辯護說:“美國人建立了一種新形式的帝國——民主帝國——因為從習慣上和歷史上,他們的政治在骨子裡就是民主的。”就好像“民主”一詞可以洗清帝國主義的一切罪孽一樣。不光跟政府接近的保守派美國學者有這樣的傾向,那些看似更為獨立的自由派學者也是一樣的。《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前言里就引用了美國著名自由派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一段話,用來說明學術界是怎樣被“美國例外論”所影響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們和英國盟友事實上佔領了世界上大片地區。我們可以成為永久佔領者,並扶植傀儡政權,就好像蘇聯在東歐做的那樣。是的,我們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這麼做了,我們在伊朗的歷史也並不光彩。但是我們主要做的仍然是幫助被打敗的敵

人恢復元氣,並建立與我們核心價值相符的民主政權,並且讓他們成為可以保護這些價值的盟友。‘美國治下的和平’是某種帝國……但按照歷史的標準,這是一個非常善意的帝國,是由軟實力和信譽而非強力凝聚而成的帝國。”雖然立場不同,但克魯格曼的這種認知,和加迪斯其實也沒有什麼本質差別。克魯格曼在美國自由派學者當中,已經算是經常跟政府唱反調的人了。如果這樣的學者對於美國擴張侵略的歷史都抱有“美國例外論”的潛意識認知,別的學者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正如希爾維特和海防所指出的:

